

清华园住了三千天

曹景行

最能感受到清华园之美的那一刻，是2008年5月末的那个早晨。结束汶川地震现场报道，我上一晚刚回到北京。早上骑车去“六教”（第六教学楼）上课，经过挂着“清华园”三个大字的“工字厅”（校长办公室）附近，突然停下来就想坐一会。四周是翠柳和各色花丛，美得像是真实世界，尤其和脑子里仍然十分强烈的灾区印象对比着。

清华很大，从我住的“西南小区”宿舍楼去新闻传播学院小红楼或者去几处教学楼，都有好几条路可以选择。无论春夏秋冬，我最喜欢的就是绕行“工字厅”前的这一片花园，而且每次都会放慢骑车速度，多享受一下四季美景和空气中的负离子。明清在北京留下的皇家园林，今天平民百姓任何时刻都可以随意走一下的，大概就这一两处了。

能在清华园里面住上三千天，应该就是我的福分。去年底重回清华参加一个全国新闻教学研讨会，我表示一个老新闻人能够退下来到大学教书，才算是完整的专业生涯。我自己年近六十时就有三个愿望，一是能到北京住上几年，感受国家政治中心的氛围；二是能到大学住上几年，边教书边整理提升；三是最好能到清华大学住上几年，那是我哥哥景仲读过书的地方；他比我年长两岁，1968年工作后不到两年因公殉职；我对那个特殊年代的清华有着特殊的记忆和怀念。

2005年7月，我来到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任教，三个愿望就这样同时实现了。开始的打算是三年，没想到延续到三个三年，成了老清华。学校提供的最好待遇，就是在老宿舍区有一套不大不小的住房，配备家具电器，三十年的旧楼冬暖夏凉。已从香港中文大学退休的妻子，和我就在清华的这个家中生活了三千天，同我们早年皖南上山下乡时间差不多长久。

一进校园马上就有松弛下来的感觉。学生已经放暑假，白天除了外来游客，只有刚入学的新生穿着迷彩服在大操场上列队军训。这场面还第一次看到，一张张红润的面孔让我感到自己真正老了。休息时间，他们拿起整齐排列在操场边的水杯，五颜六色一片。回想一下自己读大学时上课用什么样的杯子，最后想起根本就没有杯子。旁边传来一位女孩的稚嫩声音：“曹爷爷，我爸爸一直看您的节目……”

从那一天开始，我就成为清华学生口中的“曹爷爷”，新闻学院还有“范爷爷”、“刘爷爷”、“王奶奶”。学院的小红楼在清华园的正中央，左邻为灰色的百年“清华学堂”，正面朝着校内最著名地标大礼堂和大草地，再往左就是毁后重建的“二校门”牌楼，上面有着清朝垮台前夕军机大臣那桐题的“清



一个老新闻人能够退下来到大学教书，才算是完整的专业生涯。

刘惠群 摄影

华园”三字。大草地一直让我惊奇，四周没有围栏绳索却极少有人上去走踏穿行。外来游客也如此，即使每天都可见到的婚纱照照新人，最多也只是踩在边角上摆摆姿势，是尊重传统还是敬畏这一大片绿色？

清华出名，新闻学院右侧就是水利系老楼。我们所在的小红楼建于上世纪三十年代，底层楼梯前有文字介绍朱镕基总理七十年前就在这里读书，那时为电机系。我的办公室在三楼朝西方向，外面红墙上缀满了爬山虎，新嫩的枝条甚至伸进关不紧密的旧窗。夏天早上看上去一片浓绿，傍晚则是满屋金光渐渐转成赤红，与对面西下的夕阳融为一体。冬天为了挡风只能用塑料布把窗户覆盖严密，免得先前久住曼谷的米勒老师（美国人）一直寒冷。小红楼属于上世纪三十年代的历史文物，学院还不能随便自己修理。

骑车穿行校园，常觉得自己就在历史中漫游。清华人也许见过世面，2005年李敖到北大访问时被围得重重叠叠，几天后到清华就自在许多，好多学生看了他一眼就去干自己的事情。对历史名人好像也如此，要不是别的老师指点，我就不知道每天都要经过的那片灰不拉叽旧砖房，正是林徽因、梁思成、杨绛、钱锺书的“新林院7号”故居，也就是他们做学问以及为猫闹架的地方。

后来旅游卫视要我拍一集片子介绍北京我最喜欢的地方，我立马就说拍清华，私心也想趁机增多了解它的过去。如朱自清“荷塘月色”一带的熙春园和近春园，就是咸丰皇帝当皇子时的府邸，也是清王朝巨典《古今图书集成》修书之地。又如“工字厅”西侧校宣传部所在的“古月堂”，早年为女生宿舍，学生戏称作“胡堂”。男生不准入内，要追女孩只能隔墙飞书或者门口约会，钱锺书与杨绛一见钟情也是在“胡堂”门口。

有朋友来清华，除了会去“荷塘月

色”，也一定带他们去看“海宁王静安先生纪念碑”。那是王国维自沉后两年竖立，由梁思成设计碑式，陈寅恪撰写铭文，其中“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一句应可流芳永远。纪念碑位于“一教”外的小坡上，离“二校门”不远，与“工字厅”也只隔着一座小石桥，只是附近没有特别的标识，附近还常常停放许多学生的自行车，不那么好寻找。

我经常经过杨绛他们住过的“新林院”，也应该不止一次经过老太太讲的“鬼打墙”地方。那是搭着一块石板的小沟，当年日本鬼子杀了好多战士百姓。有天晚上她“独自一人，怎么也不敢过那条石板。三次鼓起勇气想冲过去，却像遇到‘鬼打墙’似的，感到前面大片黑气，阻我前行，只好退回家。”我很想知道“鬼打墙”到底怎么回事，所以每次深夜人稀灯昏一个人骑车回家，总有着这样的期待，可惜一次都没遇上。

开头几年清华家中上网不便，常在晚上去办公室。一天熄灯回家，只见整个校园都被大雾压得严严实实，

只有近处的大礼堂和“二校门”还剩下朦胧的影子，真是难得一见的美景。一路慢慢骑行，也感觉不到有什么“大片黑气”。只是扛着自行车气喘吁吁爬上三楼，却发现家门变了，原来自己错过了前面那栋楼。想起早先看过的苏联电影《命运的捉弄》，那年月造的“火柴盒”居民楼都是一模一样，那晚也算是一种“鬼打墙”吧，还好没有开门进去。

在清华住了这么久，新事旧闻纠缠一起真是写不完。最深刻的印象是校园里四季分明而强烈的色彩，还有好多好多的大树。我家四周就如此，白天阳光晚上月光都会把枝叶的影子投入窗内，随风摆动。北京本来多树，几十年前从西直门外到清华的白颐路两边都是大树，现在大概就数清华保留最多，夏日尤为浓绿。

我办公室窗外正对着一棵高大的银杏树，秋风起时树叶几乎一夜之间就会变成金色，太阳照射下强烈得刺眼。“二校门”外的那排银杏树，更是每年秋天清华的一道风景，落叶把半条道路都铺成金色，叫人舍不得踩踏。我住的“西南小区”没有银杏，但梧桐秋天落叶同样壮观。有一晚风大雨大，早上出门只见地下厚厚一层落叶被晨光照得一片金黄，抬头看树上的叶子也是一片金黄，上下包裹着四周楼房的红墙，宛如一幅巨大的立体油画。

又过了些日子北京开始下雪，整个清华园就会被白色覆盖。我遇到时间最晚的一场大雪，也带来了最美的雪景，记得是三月十八日，我刚完成“两会”采访回到学校。早上睁眼发觉外面特别明亮，窗台上已积起几寸厚的白雪。我提前半小时去上课，为的就是一路看雪景、拍雪景。天空已经放晴，蓝天白云下的积雪特别耀眼，色彩对比也特别强烈。等我上完课出来，早春的阳光已把雪融化得差不多了。那是在清华度过的最后一个春天。



躺着的海（油画）张祖英

「文汇报」微信二维码

大舅吃了一辈子苦。他从胎里便跟着我的外祖母服药，天生恶疮，经年不愈。每年暑热间犯症，总靠本乡一个妙手的郎中给药医治。这位罗姓先生，治疗小儿症疾，方圆几十里赫赫有名。然而未及治愈，罗郎中去世。外祖母得知消息，垂泪良久：“罗先生走了，阿二往后可怎么办？”好在夏天过后，大舅的恶疮居然痊愈了。外祖母深以为幸。

然而大舅自小并无半点孱弱孩子的习气，倒反生得精瘦结实，且顽劣异常。他长到五六岁上，但凡村子里小孩捣蛋闹祸的事情，往往少不了他的份。偷桃摘李不用说了，好端端路旁一片番薯地，偏要拿根长长的细木鞭子，一下一下，把路旁的番薯藤抽碎。于是今天东家来告状，明天西家来讨账。我的外祖母只好一一赔礼道歉。毕竟是瓜菜地里的一点小事，众人又皆知外祖母的好脾气，来时气势汹汹，走时总都烟消云散了。

有一回，又有人来家里告状，这次闹的祸非同小可。原来大舅把学校礼堂墙上贴着一个金色的大“忠”字，顺手撕掉了一角。学校安给他的罪责不小。外祖父待儿子一向严厉，又因丢了教职赋闲在家，心情本就极差，非得此事，怒上心头，一把拎起大舅，顺手直搦上平屋的屋顶。大舅顺着屋檐滚落下来，仆到地上，一时不知生死。告状者见此情形，不好再多言语，没声地退走了。这桩祸事后也就没人再提起。

大舅这一摔，直摔得半条命也无。第二天，脑袋肿成平时两倍大，眼睛只剩了两道细缝。但他居然又神奇地恢复过来，依旧生龙活虎地在村子里闯荡。我的外祖母病逝时，母亲十五岁，大舅九岁，小舅六岁。姊弟三人相依为命，熬到成年。大舅长成了一个精

瘦高挑的壮小伙子，有田有地，自立门户了。那是实行分田到户不久后的初夏，我还不满两岁。一日午间，母亲哄我睡下，打算趁此空隙，摇船到湖对岸的秧田里，去栽上一个钟头的秧苗。苗栽到一半，天色骤变，一时狂风四起，暴雨淋漓。待她匆匆赶回湖岸口，原先撑着的船早不知给谁冲乱摇了，避雨去了。大雨直灌下来，田头空无一人，母亲有些不知所措地扶着一根电线杆子，一面忍受着随雨水渗进衣裤的寒气，一面忧心我会否醒转下床，为了找她，从木楼梯上滚落下来。风大极了，一向文气的白马湖面居然给吹得立起青黑色的浪头，从浪尖上翻出白色的泡沫，在尖锐呼啸的风声里被吹卷起来，又飞溅回水里。

不知道大舅是什么时候来到对岸的。母亲看见的时候，他已经解开一条大船的缆绳，跳到船尾，飞快地摇起橹来。船头顶着风浪，行进得极为艰难，奔向船头，一个猛子扎进水里，以手带索，居然凭着游泳的蛮力，硬是在风浪里将大船直拖到母亲站立的岸头。等人上了船，又愣是拽着索拖着船，泗水

回到对岸，就这样从大雨里接回了母亲。这湖的两岸，有近百米宽啊。母亲忆起这桩旧事，每每落泪，叹说一人一命，大舅是这般刚硬的命，一辈子豁出力，一辈子吃尽苦。他的气力，轻易压折不了，一旦折去，便是硬生生两断。我小时候听母亲转述大舅的这些往事，并不觉得他吃苦，倒在心里把他当作一个传奇似的英雄。他还卖过棒冰。那是改革伊始，人人忙着去寻补贴家用

的新活计，大舅年轻的，也想找个挣钱的门道。不久，他便弄了个木头箱柜，柜面漆成浅蓝色，又请外祖父以红漆工整整地书了“棒冰”二字，正儿八经卖起棒冰来。那个箱柜，后来长年摆在我家旧屋里。母亲说，当年大舅就用脚踏车驮着这个箱柜，在附近的村子间穿行，叫卖棒冰。这在小时候的我听来是多么让人羡慕的职业啊。大热的夏天，卖棒冰的骑着脚踏车，拖长了语调，神气地吆喝：“棒——冰——来！棒——冰——来！”可惜大舅卖棒冰时，我还不会记事。母亲说，每听到他的吆喝声，总会抱我出门去看。大舅停下脚踏车，从柜里取出一支棒冰，揭去包装，放到我的嘴边。看我舔之下，冻得一个激灵，他便哈哈大笑。

然而大舅卖棒冰的生涯并不长久。

他生性豪爽，朋友遍地，一箱棒冰骑出去，总是分的多，卖的少，很快连本赔光，棒冰箱也终于搁置在阁楼上了。不久，大舅响应号召，到川边务工去了。他在那里找到了一个贤惠的妻子，也在一项五金生意上立住了脚。几年后，他与舅妈一起来到乡下，他们的儿子也在这里出生。然而未及喜庆，大舅妈因产后染疾住院，病势益重。他们的孩子长到六个月，却在一天夜里喂奶窒息，意外夭折。几个月后，大舅妈也病逝了。

我的大舅，我忘不了他圆睁着布满血丝的双眼，在老屋的院子里悲痛地嚎叫，直嚎到倒在地上，痛苦地翻滚。我吓得躲进屋子里去。我不晓得他该怎么站起来。然而大舅又站起来了。他回到了川边，重新开始生活。一晃三年，在乡下再见到大舅，他已穿一身体面的西装，身边又有了一位美丽温婉的妻子。几年下来，他在川边一带闯出些名堂，生意做得红火，也结交了新的朋友。大舅妈正是其中一位好朋友的妹妹。我真喜欢这位舅妈，她的眉眼和声音都是那样软软的，柔柔的。外祖父的那一溜略灰暗的平屋，惟有大舅的新房，推门进去是这样的喜气洋洋。梳妆柜上的白瓷瓶里

6月30日，在世界各地都拥有无数粉丝的巴塞罗那足球明星梅西的婚礼在他的出生地、阿根廷第三大城市罗萨里奥举行。新娘安东内拉是他9岁认识的青梅竹马，也是他两个儿子的母亲。虽说我是皇家马德里的球迷，也必须向梅西祝贺。我曾踏进巴萨主场诺坎普的草地，那是在1995年夏天，梅西刚满8岁；也曾在罗萨里奥度过一个美好的长周末，那是在2000年秋天（南半球的春天）。

那会儿我在浙大停薪留职，去哥伦比亚的一所大学访问。那年秋学期，系里为我安排了一门专业课《抽象代数》，要求用西班牙语讲授，我硬着头皮接受下来。可是，开学头一个月我就两次出游，在夏天和秋天之间来回奔走。一次是应一家银行的邀请去地地热带丛林朗诵诗歌，另一次是应南方一所大学的邀请去做学术报告。十月下旬的一天，我出发去阿根廷参加第七届拉丁诗歌节，组委会慷慨地提供了双程机票。

飞机在智利首都圣地亚哥机场转机，短暂的停留让我想起智利诗人聂鲁达，并把他与阿根廷诗人博尔赫斯作了比较。聂鲁达是感性的、肉欲的，博尔赫斯则是智性的、书卷的；博尔赫斯沉湎于想象，聂鲁达则周游了世界。聂鲁达曾慷慨地褒扬了博尔赫斯，而博尔赫斯只是认为聂鲁达的诗写得不错，对他的为人却表示了鄙夷。关于这两个国家的名字，智利以红葡萄酒闻名，阿根廷出名的却是烤肉。

降落布宜诺斯艾利斯机场以前，邻座已告诉我，阿根廷人管他们的首都叫Bs As，这一昵称容易让人忘却它的原意，Buenos Aires在西语里意为“清新的空气”。在Bs As的两天里，我造访了切·格瓦拉的母校——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医学院，科隆剧院和露天表演探戈的多莱戈公园，博尔赫斯故居，两座著名的公墓——里科莱塔和恰卡里塔，还巧遇球王迭戈·马拉多纳的40岁生日晚宴。

里科莱塔安葬着赫赫有名的皮隆夫人，有一首传遍世界的歌曲《阿根廷，别为我哭泣》就是为她写的。恰卡里塔安葬着“探戈之父”卡洛斯·加达尔，博尔赫斯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之死》里写到他，并引用了吉他手的歌词：死亡是活过的生命，生命是临近的死亡。我发现，虽然时光流逝，每天仍有虔诚的歌迷来为他点烟，夹

在河流之间

蔡天新

到他雕像的手指间。说到科隆剧院，它的名字Colón是哥伦布(Columbus)投奔西班牙国王以后的自称，而与拥有一艘哥特式大教堂闻名的德国城市同名应该是中文翻译时的巧合。将近一个世纪以来，科隆剧院对演出剧目一直是高标准严要求，这可以看作是南欧白人后裔的一种洁身自好。科隆歌剧院拥有两千五百个座位，另有一千个站席，可以想见当年韦伯的音乐剧《爱薇塔》在此上演的盛况。

当我终于来到圣菲省首府罗萨里奥，诗歌节组织者安妮在机场迎接，她上前和我拥吻的同时，顺口说出一个词dos，意思是两下，也就是说，亲完了左脸颊后要亲右脸颊。阿根廷的这一礼节并不难适应，可是男人之间也行亲吻我却有点不习惯，以往我只是在电视新闻里看到阿拉法特和他的阿拉伯同僚们这么做过。

时值春天，街道两旁的树木开满了蓝花，可以说铺天盖地。很久以后，我在东非的坦桑尼亚又见到此花，才知道它叫蓝花楸，阿根廷是它的原产地之一。突然之间我看到路边有几个骑马的男子，穿着宽松的灯笼裤，腰上扎着皮带，皮带上插着尖刀。安妮告诉我，这些人里是加乌乔牛仔。据我所知，他们中间产生了一批在吉他伴奏下吟唱的歌吟诗人，对此博尔赫斯曾津津乐道。

当我抵达巴拉那河边的一家酒店，在大堂里一眼认出了意大利诗人约瑟夫·孔蒂，五个月前我们在遐迩闻名的麦德林诗歌节上相识，由于他长得酷似美国演员马龙·白兰度，我给他起了一个雅号“教父”。放下行李之后，约瑟夫陪我去河边散步。河水宽阔而湍急，河中央有一条狭长的水道，远远看去，对岸只剩下一条地平线，有点像长江，那正是恩特雷里奥斯省(Entre Rios)。从地球仪上看，它的反面恰好是中国的江南。

Entre Rios在西语里的意思是“在河流之间”，与美索不达米亚在希腊语里的含义一样。恩特雷里奥斯因为接纳了大批意大利、德国和瑞士的移民，农业发展很快，可是，也正由于河流和沼泽的阻隔造成的交通不便使得工业相对落后。博尔赫斯的祖父出生在那里，他在一次舞会上与一位英国姑娘相识相爱，而当博尔赫斯的父亲出世时，他已经在罗萨里奥做上圣菲省警备军的上校。

与麦德林相比，罗萨里奥诗歌节规模小很多，诗人们也得以相互间彼此了解，他们大多来自拉丁民族，不然也会讲一口流利的西班牙语。有一天下午，组委会安排了一场记者招待会，我和法国诗人伊夫·迪·马诺、意大利诗人克劳迪奥·波扎尼、墨西哥诗人佩德罗·塞拉诺应邀出席。与拉丁人在一起久了，难免产生这样的想法，假如有一天美国衰落了，英语的地位会被法语或西班牙语代替。

罗萨里奥诗歌节期间一大收获是，我进一步了解了英年早逝的阿根廷女诗人皮扎尼克。她出生于东欧犹太移民家庭，中学毕业后进入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攻读文学和哲学。之后，她留学巴黎，结识了帕斯、科萨塔等拉美文学家。在罗萨里奥我看到一张诗歌报上做的民意调查结果，喜欢皮扎尼克诗歌的读者人数名列前茅。

回国时我带了一本《皮扎尼克诗歌全集》，从中译了几十首，率先将她介绍给中国读者，这些诗作收集在《美洲译诗文集》中。没想到，“豆瓣”上居然建起了皮扎尼克小组。通过与阿根廷诗人交谈，我还发现了安东尼·波契亚，他唯一的著作是《遗忘的声音》。波契亚从日常生活中提炼出了诗性的智慧，他被认为是少数几个拥有禅宗思想和东方哲学的西方作者之一，并因此受到各国诗人们的推崇。

了不起的大舅

赵霞

